

清史述得

王政尧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康熙帝在实现统一发展经济相继取得了一些重大政绩时他没有踌躇满志而是更加鲜明地提出要慎终如始他说朕览史书帝王事业贵始终如一不以尊号为贵因此他再次提出了此后正宜休养生养等具体措施并且唯恐一时怠慢不克有终他又表示若天下人都能知道他在解决噶尔丹问题时没有什么过失那他的愿望就已经满足了康熙帝即位前夕边疆远未巩固动乱局势日益严重各族人民经过明末清初的几十年战乱迫切希望安定与统一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康熙帝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认识到唯得民心为至要反复实施休养民力乃治道第一义的方针并为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正确决策从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胜利其政绩堪称卓著影响实为深远可贵的是在捷报频传形势面前康熙帝没有被胜利及颂扬冲昏头脑他既不崇尚尊号也不接受尊号而是励精图治讲求实效这对于清朝进入全盛时期有着不容视的意义



康熙帝在实现统一、发展经济相继取得了一些重大政绩时他没有陶醉，而是更加鲜明地提出要慎终如始，他说朕观史书帝王事业开始，终如一，不以尊号为贵，因此他再次提出了此后正宜休息生养等具体措施，并且唯恐一时怠慢不克有终，他又表示若天下人能知道他在解决噶尔丹问题时没有什么过失，那他的愿望就已经满足了。康熙帝即位前夕，边疆基本巩固，动乱局势日益严重，各族人民经过明末清初的几十年战乱，迫切希望安定与统一，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康熙帝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认识到唯得民心为至要，反复实施休养生民、力乃治道第一的方针，并为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正确决策，从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胜利。其政绩称卓著，影响实为深远。可贵的是在接二连三的辉煌胜利面前，康熙帝没有被胜利及成功冲昏头脑，他从不因得势而接受尊号，而是励精图治，讲求实效。这对于清朝进入全盛时期，君若不胜，的意义

© 王政尧 2004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清史述得 / 王政尧著 . — 沈阳 : 辽宁民族出版社 ,
2004.5

ISBN 7 - 80644 - 893 - 4

I . 清... II . 王... III . 中国—古代史—研究—清代 IV . K24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3571 号

出版发行者 :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 110003)

印 刷 者 : 沈阳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 : 145mm × 210mm

印 张 : 11 $\frac{1}{2}$

字 数 : 310 千字

插 页 : 1

印 数 : 1—1100

出版时间 :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 吴昕阳

封面设计 : 杜 江

责任校对 : 沈 岩

定 价 : 35.00 元

联系电话 : 024—23284344

邮购热线 : 024—23284335

E - mail : lnmz@mail.lnpgc.com.cn

王政尧 1942年9月生，河北省武安市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清史研究所教授、研究生导师、《清史研究》副主编。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广州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客座研究员、北京满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等职。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专业。1978年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自1980年起，长期担任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清代人物传稿》上编主要撰稿人。主要论文有《清初实学思潮与晚清戏剧文化的改革》、《黄梨洲年谱考辨》、《“二魏”比评》、《简论清初收复台湾》、《〈燕行录〉初探》等60余篇。一些论文先后在《新华文摘》、《明清史》、《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等刊物全文转载；韩国、美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均有论文发表。《清史研究述评》、《中国历史学年鉴》、《清史研究》等都曾专文述评。主要著作有《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三卷和第八卷（合著）、《黄宗羲》、《清代戏剧文化史论》等10余部。目前，正从事清代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



自序

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论文集，是我近二十多年的论文集。我为本书名之曰《清史述得》，其意是向关心清史研究的业内业外朋友总结、汇述我在这一领域内学习心得。为此，书中的不妥之处，还请赐教。

通过本书所分的《政治篇》《人物篇》《文化篇》三个部分，各位读者可从中了解到我的研究轨迹。1978年，我在北京门头沟区师范学校任教。是年，该校面临机构调整。其时，我在学校革委会负责人李欣华等同志的关心和鼓励下，在我的恩师、著名明清史学家许大龄教授、商鸿逵教授的热心帮助和指导下，我通过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安排的考试，并于1979年3月正式调入清史所。著名清史学家戴逸所长将我安排在以研究清前期为主的第二研究室。此后，本室室主任马汝珩教授对我一手提携，共同撰写《论康熙政绩及其思想》，开启了我清代政治史的探索。其间，我对康熙皇帝统一台湾的前前后后产生了兴趣，于是，择其要者，写了一篇小文，即《从康熙帝统一台湾的一道谕旨谈起》。其后，这篇小文有幸在1979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同年，我还在《百花山》上发表了《明朝后期门头窑工的反压迫斗争》等文章）自此，我开始了清代台湾史的研究，并将其中相关连的四篇，按照历史的顺序选入本书《政治篇》中。

1978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单位，起草了《〈清史〉编纂规划（草案）》。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商鸿逵、王鍾翰都曾专此著文，其间，戴先生提出

“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为此，清史研究所于1980年10月18日成立了“《清代人物传》研究室”，是时，我被调入该室，成为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三、五、八卷的主要撰稿人。其间，本室室主任王思治教授、李鸿彬教授及本室师友均予我热情帮助，列入本书《人物篇》的一些论文是我在完成《清代人物传稿》的基础上写出的。同时，本篇之中还包括思想家和戏剧艺术家的个案研究。

说起戏剧文化，那是我向往已久的研究课题。个中原因，首先是我非常喜好京剧和其他戏剧。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曾萌生过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明清戏剧文化的想法，并得到许先生、商先生的热心指导。1991年，我以《清代戏剧文化研究》为题，向中国人民大学申请了中年科研项目，获得通过。自此，我踏上了戏剧文化的研究之路。本书《文化篇》内的《清初实学思潮与晚清戏剧文化的改革》就是当时的成果之一。余者，如有关研究南府升平署档案、关公戏、包公戏等文章则是近几年所写，有的已经刊登，有的尚未发表，自觉还有点意思，一并选入本篇。

1995年，我应韩国庆南大学校之邀，在那里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学术访问，其间，我非常关注该校和成均馆大学校、高丽大学校等校图书馆收藏的有关《燕行录》的多种著作，我感到这些著作对于研究明清时期中朝文化，特别是清代中朝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应引起重视和研究。我的这一想法和在搜集相关资料时得到了韩国庆南大学校李铉教授，成均馆大学校宋载邵教授和正在韩国讲学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凯教授等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回国之后，我陆续写出并在中外期刊上发表了《〈燕行录〉初探》等文章，《中国历史学年鉴》《清史研究述评》《朝鲜王朝对华观的演变》等书刊均有评述，《明清史》《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等刊物相继转载。以上小文对这方面的研究发挥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是清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当年我也曾参与其间。本书选录的《黄宗羲晚年思想探析》和《黄梨洲年谱考辨》

是我在写《黄宗羲》（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和点校《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的基础上写成的。

二十五年来，我从“科研归口”时的正值中年，走到如今的年届花甲，其中一个深刻体会则是：我在治学方面每前进一步都凝聚着师友们热情关心和诚挚帮助，在这些专家学者中间，有清史研究所的潘喆、陈桦、刘凤云、张研、吴永兴、吴玉清等同志；

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近代史所、拉丁美洲所王戎笙、何龄修、郭松义、张捷夫、李世愉、商传，定宜庄、谢保成、赵云田、刘小萌、白凤森等师长和学友；

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李尚英编审；

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凯、王天有教授；

有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关嘉禄、张玉兴研究员；

有《光明日报》社高级编辑肖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教授王俊义，中央财政金融大学教授侯铁珊，首都博物馆研究员崔学谱，中华书局编审骈宇騫，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邓孔昭、李祖基，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吴元丰、唐益年、张莉、高换婷、王澈，《北京社会科学》编辑臧宇峰等各界专家；

有现在海外任教的华立教授，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宋载邵，庆南大学校俞长根、李铉、李载胜等各位学者。

对于您们和本文内敬录诸公给予我的多方面热诚相助，我将铭记在心，再一次向各位师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选录的文章分别发表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报刊，因其对注释要求各异，为保存原貌，未予划一，敬希鉴谅。

“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我喜欢这两句诗。

王政尧

2002年10月

于北京城南荷香书屋

目 录

政 治 篇

试论康熙帝不尚尊号·····	3
试论清初农民军的“联明抗清”·····	13
康熙八年起居注事辨误·····	20
康熙帝用人刍议·····	25
简论清初收复台湾·····	29
“独承恩遇出征东” ——简析《南堂诗钞》与统一台湾诗篇·····	50
康雍乾时期汉族、高山族友好关系的发展及其原因·····	62
试析台湾各阶层对马关签约的反响 ——兼议徐骥之历史功绩·····	74

人 物 篇

北京杨起隆起义简述·····	93
论黄梧投清及其影响·····	99
罗绣锦与张弘猷“抗误军需事”简论·····	114
佟养性和“佟半朝”·····	127
黄宗羲晚年思想探析·····	133
刚正廉明 始终如一 ——记清代名臣姚启圣·····	138
父廉子贪 ——记清代名臣赵申乔、赵凤诏·····	146

论清代名臣魏裔介·····	153
试析李光地论“本朝人物” ——兼议《榕村语录续集》的历史价值·····	167
清代“破肚将军”蓝理述论·····	185
试论陈廷敬的历史地位·····	197
魏长生与一道秦腔演出的禁令·····	212
“年少争传张二奎” ——张二奎卒年考略·····	214

文 化 篇

黄梨洲年谱考辨·····	225
《燕行录》初探·····	236
18世纪朝鲜“利用厚生”学说与清代中国 ——《热河日记》研究之一·····	251
《燕行录》与宣南文化·····	268
《燕行录》与通州运河文化·····	272
略论《燕行录》与清代戏剧文化·····	277
简析“升平署无朝年《旨意档》”及其重要意义 ——兼议有关脩腔的两册“无朝年《提纲》”·····	291
清初实学思潮与晚清戏剧文化的改革·····	316
清代关羽崇拜对“关戏”发展的影响·····	335
试论满族对清代包公戏的贡献·····	348
后 记·····	358

政治篇



原书空白页

试论康熙帝不尚尊号

自秦汉以来，我国的不少封建帝王都乐于让臣下给他们上尊号，加头衔，以示至尊至贵，政绩卓著。尊号约有两种，一种是生前所上，一种是死后追加。而第一位皇帝于在位期间即不断加上尊号者乃是武则天^①。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这种纯属褒美颂扬之词的尊号却越长越长。至于这些帝王的政绩究竟如何，则当别论。即使他们毫无政绩可言，甚至昏庸无道，“尊号”也照加不误。其根本目的，无非是让人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②，借以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但是，清初定都北京的第二代皇帝康熙，却一再反对上尊号，多次表示“断不受此虚名”^③。这在历朝帝王中都是罕见的。本文拟从康熙帝在多次胜利的形势之下和他晚年听到为其搞庆典而请上尊号时所持的一贯态度与原因，试作初步分析。

(一)

康熙帝（1662—1722年），姓爱新觉罗，名玄烨，乃清世祖顺治之第三子。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九即皇帝位，时年仅8岁。次年改元康熙。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16岁的康熙帝

① 见《旧唐书》，卷6，《则天后纪》。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80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99。

智擒权臣鳌拜，正式亲政。平定“三藩之乱”是他亲政以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也是清王朝由乱到治的转折点。

早在康熙帝亲政之前，他就对吴三桂“位尊权重”、“树立党羽”、妄图“永居滇中”^①的形势极为注意。康熙八年（1669年）以后，他又将他所认为最重要的三件大事“书而悬之宫中之上”^②，其中，列居首位的就是三藩之事。康熙十二年（1673年），当这场来势凶猛的叛乱爆发后，尽管举国震动，朝廷内意见又极不统一，而康熙帝对此却是“持心坚定”^③，部署得宜；谋略深沉，行动果断；“策励将时，屡促师朝”^④。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这场历时八年之久、遍及半个中国的叛乱终于被彻底平定。从那时起，康熙时期大规模请上尊号的活动便随之开始了。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第一个请上尊号的是湖广道御史何嘉祐。他在奏折中称：“天下荡平，皆赖皇上一人功德所致。”^⑤对此，康熙帝非常冷静。他深知这次胜利来之不易，并举出“吴三桂反叛以来，劳师动众，兵民困苦已极”，批驳何嘉祐，断言“此奏无益”。事隔五天，朝廷内上自诸王、下至九卿又群起请上尊号，他们以“逆首既除，四方底定”等为由恳请康熙帝“加上鸿称，以显功德”。面对这种日渐高涨的歌功颂德，康熙帝在严加拒绝之时，第一次向臣下阐述了他注重实际、不务虚名的思想。

康熙帝在这次谈话中指出，尽管叛乱已经“削平”，但“疮痍尚未全复”。他列举了“兵民交困”、“水旱频仍”、“被创者未起”、“困苦者未甦”、“吏鲜洁清之效，民无康阜之休”等多方面的的事实。他认为，当此之际，“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纪”，如

① 刘健：《庭闻录》，卷4。

② 《清圣祖实录》，卷154。

③ 《清圣祖庭训格言》。

④ 章桢：《康熙政要》，卷11，《宽仁》。

⑤ 《清圣祖实录》，卷99。

“遂以为功德”，以至“上朕尊号”并要为群臣加官晋爵，那就不单是“徒负有愧”、无“尊荣”可言，而且“实可耻也”；他坚决表示“断不受此虚名！”不仅如此，康熙帝还反复强调：从今以后，君臣之间要“益加修省，恤兵养民”，“砥节励行，休养苍黎，培复元气”，以逐步实现其“政事务求当理，官职务在得人，期于家给人足”的政治局面。如果真的这样做了，“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反之，“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最后，他再次告诉文武百官，“不必再行陈奏”，不接受尊号乃其“实意”，“非粉饰之词也”，上尊号之事“断不可行！”这番谈话深刻表明，年轻的康熙帝不愧是一个务实、求治，力图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王。

从康熙二十一年至康熙三十六年（1682—1697年），康熙帝通过统一台湾、击败沙俄、解决噶尔丹问题，巩固了清朝在东南、东北、西北的边疆。从此，国内日益安定，生产不断发展。康熙帝为实现清朝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其间，在亲征噶尔丹的过程中，前线曾出现沙俄将助兵噶尔丹的传闻，大学士伊桑阿等非常紧张，“力请”康熙帝回京，康熙帝愤然拒绝，他说：出征“不见贼返，何以对天下！”^①并严令：“逡巡后退，朕必诛之！”^②在这关键时刻，充分表现了康熙帝的决心和胆略。

由于这接连不断的胜利，朝廷的文武大臣及一些民族上层人物一次又一次地颂扬康熙帝，请上尊号。到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其规模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次，并请他接受“神圣文武大德广运”的尊号。对此，康熙帝一再坚决拒绝。从他历次的谈话看，康熙帝经历了多次征战，进一步体会到完成统一大业和巩固统治地位的艰巨性，他的务实思想更加牢固了，其中有以下三方面值得注意和研究。

第一是平易宜民。康熙帝在收复台湾以后提出：治天下之道，

① 魏源：《圣武记》，卷3，《康熙亲征噶尔丹记》。

② 《平定朔漠方略》，卷22。

“但求平易宜民而已”^①。而这种“平易之道”的目的即在于国家的“久安长治”。基于这种思想，他认为此时即使“颁赦加恩，小民未必均沾实惠”，至于接受尊号，不但“典礼甚大”、“烦扰多事”，更为重要的是“矜张粉饰”，无益于治。

第二是民族和睦。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车臣汗及其他上层人物联合请上尊号。但在康熙帝看来，为了维护清王朝的“久安长治”，保持民族间的和睦比加上尊号更实际、更有意义。在这次“上谕”中，康熙帝希望这些少数民族首领理解他的“谕和之旨”，乃“一视同仁，无分中外之至意”^②。他郑重表示：“自兹以后，无相侵扰，亲睦雍和，永享安乐，更胜于上朕尊号也。”

第三是慎终如始。康熙帝在实现统一、发展经济相继取得了一些重大政绩时，他没有踌躇满志，而是更加鲜明地提出要慎终如始。他说：“朕览史书，帝王事业，贵始终如一，不以尊号为贵。”^③因此，他再次提出了此后“正宜休息生养”等具体措施，并且“唯恐一时怠慢，不克有终”。他又表示，若天下人都能知道他在解决噶尔丹问题时没有什么过失，那他的愿望就已经满足了。

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内部，所谓“尊号”通常与帝王取得的胜利成正比。胜利越大，接受尊号的机会就越多。康熙帝即位前夕，边疆远未巩固，动乱局势日益严重。各族人民经过明末清初的几十年战乱，迫切希望安定与统一，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康熙帝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认识到“唯得民心为至要”^④，反复实施“休养民力，乃治道第一义”的方针^⑤，并

① 《清圣祖实录》，卷112。

② 《清圣祖圣训·圣德》。

③ 《康熙政要》，卷13，《谦让》。

④ 《平定三逆方略》，卷2。

⑤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32》。

为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正确决策，从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胜利。其政绩堪称卓著，影响实为深远。可贵的是，在捷报频传的形势面前，康熙帝没有被胜利及颂扬冲昏头脑，他既不崇尚尊号，也不接受尊号，而是励精图治，讲求实效，这对于清朝进入全盛时期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二)

自唐以来，为帝王举行庆典和请上尊号有时是连在一起的。而在皇帝的“整寿”及其即位的若干周年时往往是请上尊号的极好机会。这在康熙朝也不例外。仅从康熙帝 50 岁（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到康熙帝 69 岁（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期间，这种大规模的请上尊号就有 5 次，其中 4 次还多有重复。康熙帝 50 寿辰前夕，断然拒绝了尊号和文武百官的庆贺，提前离京，南巡视察河务。即使在批阅心腹之臣的“祝寿折”时，他所写的却是“近京处天旱，所以朕心不宽些”^①。最突出的是他即位 60 周年，满朝的王公大臣请求举行庆贺大典，他们在奏疏中把康熙帝捧到千古以来无与伦比的地位，并以多种理由为康熙帝搞了一个长达 20 字的尊号，即“圣神文武钦明睿哲大孝弘仁体元寿世至圣皇帝”^②。这是康熙朝群臣请上尊号的最高峰。对于这些请求，康熙帝继续坚持他历来的做法，一概加以拒绝。他感慨地说：“见今西陲用兵，外则官兵披坚执锐，冒暑冲寒，劳苦已久；内则民人负重跋涉，挽运远道，力亦疲困。兼之被灾之处，民多受累……每念及此，唯当修省图治，加惠黎元。”他反问群臣，当此之时，“有何庆贺？”^③从历史上看，一个封建皇帝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是不容易的。其所以能够如此，这同康熙帝一生中的某些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① 《李煦奏折》，27 页。

^{②③} 《清圣祖实录》，卷 291。

清朝初年，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势之争迫使康熙帝意识到，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要想长期统治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绝非容易。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他尚不满20岁，就向自己提出，对帝王的身份要有“敬畏之意”^①。他能如此要求自己，以致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势必小心谨慎，更不敢为所欲为，滥用权力，这就为他以后不接受尊号的行动奠定了基础。

康熙帝反对生而知之，注意学习和实践。他说：“为君者一身处九重之内，所知岂能尽乎？”^②就是古代的所谓“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③。他多次向大臣们强调，“朕原本无学”^④，由于“思己不知，焉能断人是非？因自愤而学焉”^⑤。如今“亦不过由学而能”^⑥，“何得谓天授、非人力也”^⑦。因此，无论是三藩之乱期间，还是出征、南巡之时，他都从不间断读书和听讲。康熙帝读书之目的在于实用，而实用的目标则是求治。所以，他“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讲求治道，见诸实行，不徒空言”^⑧。其中，他认为最紧要的是“唯当躬行实践”^⑨。于是，“务实”就成了他实现“治道”的准则。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通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对自己逐渐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他曾一再告诫群臣：“从来论人甚易，自处则难。”^⑩“朕以一身之识见精力，不敢自恃。”^⑪到了晚年，他说得更加深刻：“朕今春秋已高，

① 《康熙政要》，卷15，《论奢众》。

②⑤ 《清圣祖庭训格言》。

③⑦ 《清圣祖圣训·圣学》。

④ 《康熙政要》，卷13，《谦让》。

⑥ 《康熙政要》，卷23，《畋猎》。

⑧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13》。

⑨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19》。

⑩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39》。

⑪ 《康熙政要》，卷6，《求谏》。